

江南

观点

中华文明始于殷商？ 五千年前的良渚文明破除了这个国际偏见

刘斌 王宁远 陈明辉 朱叶菲

根据我国的历史文献,我们一般将夏作为王朝的开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开始的年代被暂定为公元前2070年。但由于处于晚商阶段的殷墟,才发现大量青铜器以及铭刻有文字的甲骨文等遗物,以致国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文明始于殷商时期。

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存在着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忽视了中华文明形成之前还存在着多个区域文明。第二个误区是将中原文明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唯一代表,而以中原文明的形成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第三个误区是以青铜器、文字作为判断文明的绝对标准,而将未发见青铜器、未破译文字的文化排除出文明之列。良渚文明的确认将有助于破除上述偏见。

我们知道,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帕文明分别处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所处地理位置相对独立,文化面貌较为统一,且均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而中华文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大的文明体,实际上是多个区域文明逐步融合的产物。

辽阔的中华大地包含多个相互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9000年开始,在这些不同的地理环境下逐步孕育出多个具有不同文化面貌、不同发展谱系的文化区系,如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甘青地区,长江流域的四川盆地、江汉地区、环太湖地区,以及北方地区和珠江流域等,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

从距今6000年开始,各区系进入文明化、城市化、复杂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间,形成了许多强势的文化,如较早的庙底沟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稍晚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更晚的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煤山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等。这些文化中不少已进入文明阶段,但这一时期,面貌统一的中华文明尚未形成,我们不妨称之为区域文明时代。良渚文明就是中国区域文明时期的重要代表。

北纬30°是一个神奇的地带,造就了许多伟大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所处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大致位于该纬度带附近。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区——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也大致处于这个纬度。环太湖流域西依茅山和天目山山地,北、南分别以长江和钱塘江为界,东濒东海,总面积约3.65万平方公里,这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繁衍。

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发展序列清晰,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立的文化区,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先后经历了马家浜文化(5000-4000BC)、崧泽文化(4000-3300BC)、良渚文化(3300-2300BC)、钱山漾文化(2300-2100BC)和广富林文化(2100-1800BC)等发展阶段。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马家浜晚期末段,东山村遗址便已出现编号为M101的早期权贵墓葬,墓中随葬品共33件(套),其中玉器21件,玉器种类有玉瑗、玉块、玉管等,该遗址还发掘出一批公元前3800年前后的崧泽文化早期的随葬较多陶器、玉器、石器等的贵族大墓,这些大墓集中于一个墓区,与小墓分开埋葬,显示出当时已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分化。马家浜、崧泽时期的文化积累为良渚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良渚文明所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2300年,这是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经历了黄河流域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油子岭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和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扩展与融合的大发展之后,各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逐渐走向一段稳固而快速的发展阶段。良渚文化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支。良渚文明存在的时期,也正是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文明开始出现的年代。鉴于此,我们认为以良渚文明为代表的这一时段,可称为良渚时代,它上承庙底沟时代,下启龙山时代,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诞生及发展的重要时期。

良渚古城遗址是整个良渚文化的

核心,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它与良渚玉器等一同构成良渚文明的最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余杭地区,处于一处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C形盆地北部。古城南北分别峙立着大遮山和大雄山两座天目山余脉,西部散布着一系列低矮山丘,这三处山体均距古城约2公里,向东则是敞开的平原,总体有一种以山为郭之感。发源于天目山脉的东苕溪,自西南向东北蜿蜒流过,最终向北注入太湖。可见,古城所在的区域有着广阔的腹地、优越的自然环境,由此带来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自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和确认之后,经过七八年不间断的考古发掘、调查和勘探,我们对良渚古城的结构布局和格局演变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可分三重,最中心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其外分别为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城,堆筑高度也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同时古城北部和西北部还分布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和与天文现象观测年有关的瑶山、汇观山祭坛,在古城外圈也存在着广阔的郊区。良渚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外围郊区的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整个城市系统的布局与山形水势充分契合,显示良渚先民在规划古城之时视野之广阔。

良渚人创造的规模庞大的城市系统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莫角山宫殿区堪称中国最早的官城,宫殿区的面积远远超过年代更晚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头的宫殿区或官城。宫殿区、内城、外城的格局类似后世都城中官城、皇城、外城的三重结构体系,这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以8平方公里的外城计算,其占地规模一直领先了1500年,直到距今3500年前后才被郑州商城超越。

(作者均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沪苏浙皖之间的联系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人们却可曾知晓,早在五千年前,这片土地就是文明高地,孕育出华夏版图上光彩夺目的区域型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留下掷地有声的实证。并且,随着考古的持续推进,良渚文化还在不断刷新人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距今5300年至4300年。大多数人对于它的印象,或许停留在亮相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上的良渚玉琮。玉琮上作为神人、信仰象征的神人兽面纹,以及一毫米刻四五根线的细密阴纹线刻技艺,无不折射出良渚文化的璀璨。事实上,对于良渚玉器的认识,绕不开它所身处的场域——良渚古城。这正是整个良渚文化的核心。

1936年,一位名为施昕更的学者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的偶然发现,掀开了良渚文化的神秘面纱——当时,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石器、玉器于此出土。略显尴尬的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良渚文化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仅仅被当成东方文明的曙光一缕,鲜少有学者强调它已经明确跨过“文明”的门槛。是自

上世纪80年代起的一连串考古重大突破,令良渚文化一次又一次惊艳世界:1986年、1987年,反山、瑶山两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大型墓葬相继发现;1992年,超巨型建筑基址——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浮出水面;2007年,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最终得到确认;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震惊世人……

良渚古城在中国同时期古城中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在世界同类遗址中都极为罕见,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则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设计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堪称“世界第一坝”。拥有完整都城结构的良渚古城,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这一切,一方面令人不禁好奇,五千年前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方国,另一方面却悄然拉直了一个问号,当时国家已出现,文明已形成。

今天,让我们走近良渚文化,走近长三角城市群这一绵长深远的文化基因。

——编者



良渚玉琮

良渚玉钺

建设中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视觉中国)

中国最早的“城乡分野”出现在长三角

良渚遗址缘何令世界惊叹

秦岭

对良渚遗址的认识,建立在80多年来考古发现和不断积累的考古学证据和核心地位的基础上,对遗址群重要性和核心地位的认识,更离不开整个环太湖地区对良渚文化及前后新石器文化的工作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支撑下,才使得考古学界基本形成了关于良渚文化社会形态、经济水平和信仰体系等方面的一些共识。

良渚遗址明确揭示史前中心城市的形成,在东亚同时期中难得一见

从本体价值的路线出发,良渚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目前所知等级最高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至少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的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这个中心的形成,是中国最早的“城乡分野”。目前的考古研究成果,已经能够充分体现这一史前文明中心城市规划营建的整体过程。考古学家们很早就已经认识到良渚遗址内不同于一般聚落的布局结构,对应的肯定是一种非一般农业村落的社会形态。而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编年序列的建立,则使这个权力中心的布局 and 规划过程进一步得到明确。遗址群南侧大雄山南麓发现了官井头遗址,在良渚早期墓葬中出土了丰富的刻纹玉器,可以跟瑶山进行比较;遗址群东部临平地区发现了玉架山遗址,墓地跨度从良渚早期到晚期,早期大墓也出土了刻纹玉琮等高规格玉器,这些发现,使良渚早期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展了;中期阶段,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水坝遗存,由彭

公地点开始陆续发现并确认的西部山间水坝,结合原有的塘山土垣,构成了良渚遗址的整个水利系统,这一阶段在遗址群西北方向营建公共水利设施,其所覆盖的空间范围是有限的,通过复原显示,大雄山南麓、临平地区等良渚早期已经出现的聚落显然不在所谓“水利系统”的覆盖范围内,而这个“权力中心”的地缘边界反而是通过对水资源的管理进一步明确起来;良渚晚期的权力中心在空间上更为向心集中,进一步在已有基础上通过古城墙的使用来强调“城乡”之别。良渚遗址的形成,可以说是对其中心地位不断塑造、固化和扩展的过程——能这样明确清楚地揭示一座史前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的历史进程,这在东亚地区同时期的文化中难得一见。

其次,良渚遗址作为整个良渚社会的权力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区位优势;权力中心并不是地理区位上的中心,这是良渚遗址的特殊性所在,也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一般而言,早期文明的中心城市都建立在交通枢纽位置,不管是贸易还是分配,地理区位优势都会有所体现。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偏居一隅的良渚遗址,肯定不是随随便便就定的“都”,一般都认为这个权力中心地理位置的选择和对特定资源的控制是有内在联系的。换言之,遗址群作为良渚文化中心,是通过玉石资源和背后所承载的信仰体系的控制管理来实现其社会权力,来维持文化的统一性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这样一种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模式和机制对于在世界范围内理解复杂社会和早期文明/国家的多样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良渚遗址作为这个文化的

中心,它在物质层面上的表现是非常内化的,它是一个辐射式文明的内核。这种向心性的表现,最突出的是在良渚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上。目前所见最精美的良渚文化玉器(尤其是早中期阶段)几乎全部都出自遗址群内;跟其他良渚贵族墓地比较,遗址群内大墓出土玉器在材质上的单一性、风格上的一致性也是格外突出的。良渚遗址出土玉器同周边其他良渚大墓的关系,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直接联系的实物证据,但这些相似的玉器背后,大多是点对点且是往外发散的关系,早中期阶段几乎没有在遗址群内看到过外来玉器及其影响。良渚遗址有能力进行玉器生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权贵们对玉石器的使用是一种自我消费的模式。这种只用于自家产品的态度,是一种对玉石资源“正统性”的认定,也正是在不断生产和消费这种“正统性”的过程中,良渚遗址的中心地位得以巩固,其辐射范围也逐步扩大。在良渚文化的外延区,可以看到蒋庄、花厅、好川等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无一例外都需要使用良渚玉器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再往外看则是玉琮这种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礼器脱离并独立于其所发端这片精神土壤,扩展至龙山时代各区域中心,并为后世所继承。遗址群的兴起和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多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它所代表和达到的早期文明高度是其价值所在,同时这种辐射式文明最终的衰亡也是其价值所在。缺乏交流与吸收,是否就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和动力,这是良渚遗址作为一种形态的早期文明中心,其兴衰历程对文明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良渚玉器引出的“藏”而不露,包蕴着突出的东方价值观内核

从价值传承的角度,不妨把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等各方面成就,落脚到对后世文化和区域传统的影响上来讨论。首先是在经济形态上,良渚代表了在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就有差别,具有独特性。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的。同时,除了突出良渚文化稻作农业本身的价值以外,稻作发展也是理解遗址群水坝和水管理系统能在这个时候产生的生业经济背景;是良渚玉石手工业经济能蓬勃发展走向顶峰的经济保障;还是长江下游湖网水路“鱼米之乡”这种湿地文化景观的源头。

良渚在物质文化层面最重要的贡献肯定是玉器。良渚玉器的重要性需要放到不同角度来阐释。从手工业技术上讲,良渚玉器,说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术所能达到的顶峰毫不为过。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遗址群内反山、瑶山出土玉器所达到的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同时,良渚也是中国玉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玉通灵”这一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应该说在良渚文化中得到了最早、最完整的体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制玉技术的发达和玉文化的发展在各区域的考

古学文化中均有体现,如何通过横向比较来突出良渚玉器的特殊价值需要重点考虑。从技术层面上,手工业达到的专门化程度,体现在良渚纹饰的统一性、玉器形制的规整性上,这些与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后来的后石家河、齐家、陕北等区域文化有所区别,特别是良渚阶段几乎已经看不到因制器器所造造成的同类玉器材质、体量、形态等方面的多样性,也看不到不同手工业群体背后制作工序和技术的差别——这种玉器成品的“标准化”,体现的是对玉料资源的掌控和分配能力,对技术和概念的精准传递,也是社会组织分工所达到的水平。从玉器的功能上讲,其他文化没有像良渚、特别是良渚遗址这样,表现出对墓葬内玉器摆放使用的强烈而明确的制度性。通过用玉制度来表现社会身份,包括等级、性别甚至地域上的差别,这是良渚社会所特有的、发挥最为极致的一个特点。这反映出玉器在建立、维持和体现早期复杂社会秩序中的功能,这一功能是在其他中国新石器文化没有能够充分体现的价值。

第三,良渚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从上述玉器功能引申出来的“藏礼于器”的传统,这种将“礼”体现在特定器物上的表现方式。这一传统,连接了中国的史前文明和青铜文明,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和结构的稳定性。进一步从更大范围文化比较的视角说,西方纪念碑式的仪式传统的形成,对应东方宗庙式的社会秩序的表现,这个“藏”而不露的物质性是非常值得突出的东方价值观的内核。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